



叙事视阈

新世纪长篇小说综论

杨剑龙 等 著



叙事视阈

新世纪长篇小说综论

杨剑龙 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事视阈：新世纪长篇小说综论/杨剑龙等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21-6312-0

I. ①叙…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1081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钱 祯

书 名：叙事视阈：新世纪长篇小说综论

作 者：杨剑龙 等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6.5

插 页：2

字 数：415,000

印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978-7-5321-6312-0/I · 5040

定 价：35.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导论:新世纪新常态语境与长篇小说创作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社会延续着 20 世纪 90 年代的惯性前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流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倡等等,使新世纪的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新常态中,在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大格局中,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象,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是其表现之一。

2008 年,有学者就统计说,“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 17 年里,总共只有 260 多部长篇小说面世”^①,“从数量上说,1976 年(10 月以后)、1977 年、1978 年、1979 年,中国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分别是 5 部、58 部、65 部、89 部”^②。“上世纪 80 年代,长篇小说总数在 800 部至 1000 部;而从 1998 年以来,每年长篇产量均突破 1000 部。”^③“2001 年至 2007 年仅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 6000 余部,每年有 800 至 1000 部新作问世。这其中也不乏精品佳作。”^④“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首次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有 2000 余部。”^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布的 2012 年《文学蓝皮书》指出,“2011 年,长篇小说的年出版总量仍然稳定在 4000 部以上,而且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地提升”^⑥。国

① 周南焱《长篇小说:数量井喷,出手太快》,《文学报》2008 年 3 月 20 日。

② 肖敏《新时期长篇小说(1976—1980)的前史分析》,《学习月刊》2011 年第 24 期。

③ 周南焱《长篇小说:数量井喷,出手太快》,《文学报》2008 年 3 月 20 日。

④ 李衍柱《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文艺报》2009 年 2 月 19 日。

⑤ 中国现代文学馆《2010 中国文学发展状况:2000 余部长篇小说首发》,《人民日报》2011 年 4 月 21 日。

⑥ 《文学蓝皮书:长篇小说的年出版总量在 4000 部以上》,中国新闻网 2012 年 6 月 26 日。

家书号中心统计材料,2014年国内出版长篇小说约有4100多部^①。虽然,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出入很大,但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逐年递增数量令人咂舌,却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小说创作繁荣与新世纪的语境相关,与中国社会走进了一个新常态有关,这促进了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兴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市场化商品化的历程,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市场化特征,以往由作家创作→出版社出版→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诞生或生产的链被改变了,呈现出出版社调查或窥视文学市场→作家创作→读者阅读的过程,构成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生产链,从某种角度也刺激了某些文学作品的产生。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商品化的进程逐渐规范化,出版社、杂志社等文学出版与刊载的机构均已企业化了,码洋和印数等成为作家创作影响市场的根本。美国教授保罗·韦斯托弗指出:“学者们记得浪漫主义时代作为文学名流史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作者成了商品品牌,并制造了自己的不朽的神话。浪漫主义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诗人-英雄’这个可市场化的商品,正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所说,作家的反市场行动成就了作家的商业地位,作家写作成了一个商业中的生产者和商品。”^②他指出了文学与市场的密切关系。甚至有学者说:“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文学的商业化都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已经显现出它的生命力与活力。”^③他认为商业化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世纪以来,文学是商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家们、出版商、文学杂志关注读者、关注市场也已经成为常识。有学者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文学消费圈层的扩大,不仅意味着文学创作与经济生活关系的密切,而且对创作本身而言,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写作活动。”^④这就道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某种角度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在文学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市场化的运作、媒体的宣传、奖项的设置、网络文学的兴盛等,都从不同角度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与发

① 何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谈2014年长篇小说——依流平进中“眼前一亮”》,《羊城晚报》2015年3月15日。

② Paul Westover, *Necromanticism: Travelling to meet the dead, 1750 - 186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99.

③ 赵洪漫《商业化:市场语境下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文艺生活旬刊》2011年第4期。

④ 高小康《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展,刺激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

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趋势,在告别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文化时代后,我们逐渐进入了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对于“铁肩担道义”宏大叙事的淡化,对于轻松愉悦文化消费品的钟情,构成了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流行的趋势。“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技术化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同时还含有经济、政治的因素。”^①在对于国家、民族、革命等宏大叙事的相对淡化后,人们对于物欲的追求、对于消费的欣赏、对于时尚的渴望等,构成了以消费性、时尚性、享乐性为指归的大众文化追求,也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倾向。美国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将工业化了的大众社会视为是一个充满了单调、平淡、平庸、丧失人性的社会,人们在富裕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孤独感。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电影、电视、无线电、报纸、杂志等)的表现与传达,暂时可以克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危机感,但它可能大大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虽然并非如西方工业化社会是充满了单调、平淡、平庸、丧失人性的社会,但大众文化的兴起却是十分明显的,这当然与大众媒介密切相关^②。

在大众文化流行的语境中,追求娱乐追求世俗追求轻松成为一种文化消费的基本倾向,在这种倾向中,荧屏节目的娱乐化、时尚化,娱乐节目的轻松化、戏谑性,通俗文学读物的占有市场重要份额等,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流行的现象。有人说:“大众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感官享乐性消费文化,也是一种鼓励物欲的商业促销手段,其时尚性具有裹挟压迫的塑造力,使人在心甘情愿的从众中,按照它的模式生存、感觉、消费。”^③在大众文化流行的语境中,长篇小说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一部分,这也刺激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与生产。

在中国社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文化的繁荣发展受到了特别的关注。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国策,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

① 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② 杨剑龙《大众文化与文学的世俗化》,《文艺报》1999年11月2日。

③ 刘国彬《大众文化和商业化》,《文艺报》2003年3月6日。

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①胡锦涛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问题,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在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内涵,他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阐释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而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②。

在党中央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各地都将文化建设和发展视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文学创作领域,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各地区文学创作的水平,因此引进文学人才鼓励长篇小说创作成为一种趋势,从人才、资金等方面加以扶植和奖掖。

在新世纪的语境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的评选,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诸多渐入老境曾经的文学爱好者也纷纷步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行列,许多锋芒初露的青年作家也将创作长篇小说当作晋升文学层次的台阶,一些网络写手得到众多读者关注后,作品也从网络转向纸面,形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年产4000余部的壮举。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5日。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逐渐处于稳定发展的新常态,在世界动荡的政治格局中,中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中国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中国也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得到了诸多作家们的关注与表现,不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者的视野。

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女性文学仍然成为诸多女性作家所好,以浓郁的女性意识叙写女性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有的展现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样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百年沧桑,展现了萨满妮浩的博爱胸怀和牺牲精神;王安忆的《天香》以江南“顾绣”的源流历史为线索,呈现三代女性如何支撑使香火得以延续;葛水平的《裸地》讲述从清末到土改山西暴店镇盖氏家族的兴衰史,展示了中国女性的苦难与坚强。有的揭示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成长历程:王周生的《性别:女》在对于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及性别歧视描写中,展现一家六个姐妹、两代女性的不同命运;张洁的《无字》在展现中国近百年间的风云际会中,叙写一个家族四个女人的人生遭际;王安忆的《桃之夭夭》在都市市井的历史嬗变中,展现郁晓秋半生坎坷的人生历程。有的揭示女性社会的种种问题:毕淑敏的《女心理师》以女心理师贺顿的事业和情感故事,探讨了女性择偶观、家庭观等问题;王周生的《生死遗忘》以老护士长凌德馨与老年痴呆症男人的爱情悲剧,关注社会老龄化问题;范小青的《女同志》以女干部万丽的宦海沉浮,揭示了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

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乡村与农民成为长篇小说描写的重要题材,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互动与对立成为作家们描写的重要方面。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描写乡村男女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的坎坷境遇,也展示乡村在城市冲击下产生的变革。尤凤伟的《泥鳅》、关仁山的《麦河》描写在城市中苦苦挣扎的异乡人,难以摆脱为生存而走向堕落的历程。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描写从城市返回乡村的人们守望家园发家致富的新气象。阎连科的《炸裂志》呈现城市化对于乡村生活挤压中乡民们人性的变异、伦常的瓦解、道德的沦丧。李佩甫的《城的灯》呈现了乡村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冲突。毕飞

字的《玉米》、《平原》揭示基层权势对于乡民们的欺凌压迫。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呈现对权力的热衷和村民人性的扭曲。阎连科的《受活》展示了在权力和欲望双重挤压下乡土的生存困境。李佩甫的《金屋》、阎连科的《丁庄梦》反映了农村在经济繁荣后出现的精神和文化的错位。贾平凹的《秦腔》、《带灯》是乡土生活与乡村文化的挽歌。张炜的《刺猬歌》、《柏慧》表达了融入野地坚守家园回归自然的理想。贾平凹的《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在对乡村历史的回眸中呈现出深刻的反省意识。

城市是现代文明集聚之地,城市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描写的重镇,王安忆、叶辛、陈丹燕、王小鹰、邱华栋、张欣、范小青等作家,以不同的生活取向、艺术追求展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世纪都市小说创作中,有的通过人物命运回溯社会历史:池莉的《所以》叙写了女主人公三次失败的婚姻经历,展现了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历史变迁。叶辛的《华都》以华都大楼中各种人物的遭遇与命运,反映了近百年不同时代上海人生活形态、人际关系的嬗变。有的展现都市闯入者的命运与困境:王安忆的《富萍》描写富萍这个外来的年轻女子渐渐融入上海的过程。盛可以的《北妹》写出了北方女子在南下深圳过程中对都市的反抗。王昕朋的《漂二代》表现了北漂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时的焦虑失望。范小青的《城市之光》描写打工者在城市的陷阱中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有的描写都市物欲对人性的吞噬:邱华栋的《花儿花》通过一对城市白领夫妇的情感生活恩恩怨怨,展现出在物欲化世界里人性的异化。张欣的《浮华背后》以海关关长公子和演艺小明星疯狂浪漫的爱情故事,演绎出在欲望泥淖中沉沦的都市浮世绘。范小青的《城市表情》以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改造,呈现出宦海和商场错综复杂的争夺与角逐。有的描写都市人的情感危机精神困境:张欣的《不在梅边,在柳边》描写大都市男女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的情感困惑与精神危机。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通过一个充满悬念的爱情悲剧展现出人们的精神困境和人性的复杂。王强的《圈子圈套》反映了都市白领在职场中的激烈竞争艰难生存。有的回溯都市人的传奇故事: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讲述了武汉汉剧艺人水上灯的传奇人生。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叙述出租车司机被劫持步入黑道的奇特人生。陈丹燕的《鱼和它的自行车》叙写弄堂女孩寻找爱情的过程,呈现一个少女到为人妻母的人生历程。

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地,对于大学生活的关注与描写成为长篇小说重要

的题材。新世纪描写大学生生活的作品大多以一种揭露或批判的视角,或描写象牙塔里的明争暗斗:朱晓琳的《大学之林》中因九州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一职引起了知识分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叶炜的《大学.COM.狼》里以江校长为首的保守派与以张副校长为首的改革派势不两立。纪华文的《角力》中的知识分子们为硕士生导师和副院长职位展开各种角逐。史生荣的《大学潜规则》揭露大学潜规则中的知识与权力、金钱与名声的交易。朱晓琳的《缺氧》揭示两个学术权威为争霸的明争暗斗落井下石。或揭示大学的畸形和病态:汤吉夫的《大学纪事》中的新校长为办国际一流大学而大量扩招、疯狂盖楼、高薪挖人。倪学礼的《大学门》中的孟校长发动了轰轰烈烈不择手段的争取博士点运动。石盛丰的《教授横飞》中的副教授侍郎每年都要上500多节课,忽然倒在会议室死了。阎真的《活着之上》通过知识分子聂志远的追求和挣扎,揭露高等学府的学术腐败和潜规则。或描写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邱华栋的《教授》中的教授赵亮为利益集团出谋划策跻身于新富人阶层,他甚至包养情妇、嫖妓、找人代孕。阎连科的《风雅颂》中的杨科副教授在发现妻子出轨后,他回到耙耧山脉老家见初恋情人付玲珍,玲珍死后,他又思慕玲珍女儿小敏。张者的《桃李》中法律系教授邵景文功成名就后为金钱美色所动,游刃有余地处理和妻子、梦欣、董小令等众多女人的关系。老悟的《教授变形记》中的人文社科部主任皇甫钟贤是一个色狼,他与余小浪、霍丽友、潘茹莲等人有过性关系,他骚扰杨丽芬、盘紫薇、松玉华等诸多女性。

军旅文学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重要领域,呈现出我军推行新军事变革后复杂多变的状态。在新世纪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有的描写军队改革的艰难:李海鹏的《团政委》中的团政委姜海河被调到问题重重的307团,坚决抵制不正之风,重振307团雄风。黄献国的《炮兵家园》讲述炮兵团长、政委努力解决部队营房建设落后问题、打造美丽军营的故事。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描述师长萧广隶正视空军一〇七师痼疾、锐意改革狠抓部队战斗力的故事。有的讲述部队克坚攻难的故事:兰晓龙的《士兵》讲述许三多在战友帮助下摆脱困境、逐渐成长的故事。苗长水的《超越攻击》叙写三位军人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突破困境、突破自我的故事。柳建伟、杨海蒂的《石破天惊》描写工程兵团长屡屡遇挫但咬牙坚持完成导弹巢穴工程建设的经过。有的描写军人的情感波折:庞天舒的《白桦树小屋》叙写边防连军人凄美的爱情故事,全连向连指导员未婚妻小雪隐瞒指导员牺牲的噩耗。刘静的《戎装女人》叙写女大校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

界,突出了多难历史中的家长里短和恩怨纠葛。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叙写武警总队参谋长贺东航发现妻子出轨,老情人苏娅重新走进他的生活。有的叙述军队军人成长历程:翟晓光的《红海洋》记叙中国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坎坷历程。北乔的《当兵》描述几位武警战士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陈怀国、陶纯的《红领章》叙写70年代入伍军人的成长奋斗史。

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知青题材仍然为作家们所关注。在知青长篇小说创作中,有的叙写知青生活的个人遭际:懿翎的《把绵羊与山羊分开》讲述了一个年轻叛逆的女知青如何在特殊年代里悄然成长。韩东的《知青变形记》讲述了主人公罗晓飞在农村插队时遭到同伴陷害、告以奸牛罪的坎坷人生。杨剑龙的《金牛河》展示了偏僻小镇上知青、排工、农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有的讲述知青年代的爱情故事:王跃文的《亡魂鸟》叙写美丽的女知青维娜与农场才子郑秋轮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遭到了农场场长郭浩然的迫害而酿成悲剧。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描写知青静秋与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老三淳朴自然的爱情,老三却不幸得白血病去世。高满堂的《北风那个吹》以“铁姑娘”牛鲜花与知青帅子曲折多难的恋情,讴歌了默默无闻执著守望的乡村女子牛鲜花的真情。有的描述荒诞年代里的欲望:林白《致一九七五》是女主人公李飘扬对往昔岁月的追忆,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有的展示荒诞年代里的欲望:苏炜的《迷谷》以闭塞山林中知青生活的描写,触及了人与自然、情欲与社会、偶然与必然等话题。廖东明的《太阳升起》描写知青方晓在海南建设兵团的生活和爱情,以及在残酷的现实中的磨难与坎坷。有的叙述返城知青的命运:郭小东的《暗夜舞蹈》描写了一批知青在海南黎母山的艰苦生活,展示了他们返城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叶辛的《客过亭》通过老知青们重返插队之地,对于那个年代的所作所为追忆和忏悔。韩少功的《日夜书》以白马湖茶场的知青生活为背景,讲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及其返城后的遭遇和危机。王东的《寻找知青杨春花》描写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和返城后的遭遇,再现了青春岁月的痛楚与挣扎。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工业建设仍然是作家们所关心的题材,虽然“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近年来不尽如人意”^①,但是仍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长篇作

① 贺绍俊《工业题材与工人立场、城市立场》,《工人日报》2013年6月24日。

品。有的为中国工业树碑立传：高满堂的《钢铁年代》回溯东北工业重镇鞍钢的历史变迁发展变化。赵雁的《红昼》讲述龙溪钢铁公司40余年的发展历程。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描绘中国石油工业艰难坎坷不断发展的创业史。管新生、管燕草的《工人》讲述一个工人世家祖孙四代的命运沉浮。有的揭示企业的生存困境：向本贵的《遍地黄金》描绘了国营大型金矿企业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矿工们艰难的生存状态。楚荷的《苦楝树》是国企改革过程中最底层工人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李宏林的《非常城市》写出经济转型过程中厂矿四万工人和七万家属的改革阵痛。有的思考企业和工人的未来：楚荷的《工厂工会》探讨国有企业改制后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工人如何重新获得主人地位。曹征路的《问苍茫》寄寓了对工人阶级命运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的探寻。于泽俊的《工人》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对待几亿农民工的问题。

历史小说总是图书市场的宠儿，新世纪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世纪历史长篇小说呈现出新的倾向，有的梳理帝王们创业的历史：包丽英的《蒙古帝国》描述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杰出人物，成就了由开创帝国、征战欧洲到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的惊天大业。毛颖的《大秦帝国》描写秦王朝一统天下的历史，秦王们前赴后继励精图治。周建行的《大明帝国》通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猜疑多变冷酷无常的勾勒，反映大明帝国波诡云谲腥风血雨的历史。司马路的《东吴帝国》描写东吴孙权曲折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将英雄的历史、国家兴亡与人性解读熔于一炉。有的着力阐释历史传奇故事：冯占宇《大汉王朝》从汉高祖刘邦充满传奇的一生说起，解析大汉王朝的建立以及帝国初期的历史迷局。王进、刘乃顺的《北朝英主》以山西北武当山作为背景，展示魏晋南北朝时正义与邪恶较量孝文帝的传奇故事。门岗的《帝国之梦：忽必烈全传》对铁腕君主忽必烈的一生作了全面介绍，演绎出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熊召正的《张居正》以张居正与玉娘、与李太后的微妙情感关系描写，将帝王将相丰功伟业描述还原到儿女情长中。有的着意描写历史人物的命运：姚尚友的《无可大师》描写明清复社领袖方以智由风流文士成为一代高僧的悲情命运，折射出文人的心路历程和时代变迁。张军的《大清官场》以浙江巡抚、浙江学政、七品知县三人在调查一起大贪案时，却道异路殊、矛盾重重，在大清官场掀起一场风波。林獐的《苍狼秘史》描写成吉思汗和他的王朝，思考和追问历史深处的执著追求和英雄之梦。孙皓辉的《大秦帝国》以国君、丞相、将军等形

象的真实描写,体现了历史人物塑造世俗性回归的倾向。

与历史题材创作不同,革命叙事类作品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书写,这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之一。新世纪革命叙事类长篇小说有以革命历程描写的史诗类作品:黄亚洲的《日出东方》以“五四”运动到井冈山会师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再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坎坷历程。赵万里的《西柏坡》以1947年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为背景,描写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过程。张惟的《血色黎明》以“五四”至抗战前夕闽西苏区为背景,呈现出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风云变幻。有重新审视历史事件的反思类作品: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叙写了集英雄与土匪一身的“爷爷”革命者故事,对于英雄与英雄主义进行反思。柳建伟的《爱在战火纷飞时》描写出身名门望族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张世杰的故事,反思革命与人性的冲突。李洱的《花腔》对于抗战期间革命烈士葛任生死之谜的探究,反思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有叙写人物跌宕命运的传奇类作品:都梁的《亮剑》描写革命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朱秀海的《音乐会》讲述朝鲜抗日志士携儿女流亡中国的传奇故事。傅建文的《长征谣》叙写红军妻子栀子千里寻夫的传奇故事。有描写地下党员斗争的谍战类作品:高杰贤的《拂晓长春》描写解放长春的战役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梁的《狼烟北平》描写沦陷区北平中地下党残酷惊险的谍战工作。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描写江淮地区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地下党的抗日锄奸斗争。

随着白领阶层人数的激增,职场小说在新世纪作品中引起关注,出现了诸多令人关注的长篇作品。在职场小说中,有的讲述职场竞争故事:付遥的《输赢》讲述两大跨国企业销售高手争夺订单扩大销售决战中国市场的故事。王强的《圈子圈套》描写著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代理首席代表掉入好友设计的商战圈套的故事。崔曼莉的《浮沉》叙写外企职场的竞争与争斗中各色人物的浮沉。有的描写职场成长故事: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讲述杜拉拉从小职员成长为企业高管的故事。聂昱冰的《“白骨精”养成记》讲述职场丽人欧兰在职场的争夺中成为华北区正总裁的故事。零因子的《无以言退》叙述IT职场人从业后如何成长的经历。有的讲述职场爱情故事:莲静竹衣的《职场十年:从职场白丁到职场达人》讲述董悠然在职场稳步发展中爱情的峰回路转。蓝调水晶的《双面独狼》描写兼具天使与魔鬼双面性格的李儒泓的职场生存与爱情故事。沈童的

《白领丽人2.0》讲述白领丽人米兰在职场拼搏中与富家公子和帅气男孩之间的情感纠葛。

新世纪长篇小说以多样化丰富性的题材呈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社会步入新常态过程中展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也蕴含着作家们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等方面的诸多思考与叩问。

三

长篇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进入新世纪后在文学叙事中有了一些新的倾向,推进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关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在叙事方式上也呈现出更关注史诗性的叙事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多地呈现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就是描述历史或家族的故事,往往也在家长里短油盐柴米的琐屑描写中,呈现出细节的丰富和生动,展现出人生的琐碎和平凡,呈现出长篇小说的日常化叙事。贾平凹的《古炉》以记忆中故乡小山村的“文革”生活为原型,以“密实的流年式”^①的写实笔法叙写“文革”背景下古炉村村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心态。作家不精心设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是努力把“文革”背景下古炉村村民的心理心态和所作所为琐琐碎碎地展现出来。王安忆的《天香》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演绎申家天香园由兴盛至败落的历史,将传奇的故事融入日常生活的琐碎描写中,印证了“过日子才是硬道理”的理念。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以中国农村女性木珍口述实录的方式,呈现农村发展与嬗变的历史,具有普通村妇的口无遮拦闲话唠嗑的琐碎。金宇澄的《繁花》以阿宝、沪生、小毛等上海市民生活的叙写,展现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都市生活,大多是与作家记忆相关的日常叙事。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对于日常叙事注重的作品屡见不鲜:陈丹燕《鱼和它的自行车》、肖克凡的《机器》、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高满堂的《大工匠》、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都可以见到作家对于平常普通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甚至忽略小说情节的张力、淡化小说的矛盾,在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的细致描写中

^①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呈现生活的本真色彩。

20世纪90年代后,文坛出现了私人化写作的倾向,在蔑视铁肩担道义的文学传统中,将个人的生活细节作为文学写作的素材,甚至标榜自传体、半自传体的小说创作,在故意夺人眼球的题目下,呈现出某些作家对于世俗化庸俗化文学市场的献媚。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再标榜小说创作的自传体、半自传体,而在将个人人生故事的沉淀与加工后,形成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厚与真切,在这些私人化叙事中,人生的经历、生活的曲折、历史的记忆等,都成为作家叙事的素材积累和情感抒发。马原的《牛鬼蛇神》以大元和李德胜为主人公,以北京、西藏、海南、上海构成人物从1966年到2011年生活的背景,小说中大元的人生轨迹与作家马原本人吻合,使小说有着浓郁的私人化色彩。韩东的《知青变形记》描写知识青年罗晓飞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曲折荒诞的传奇经历,揭示知青“我”十年间从知青到农民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作家随父母下放农村的记忆。杨剑龙的《金牛河》叙写“文革”期间插队知青小宋在深山里与原军垦农场场长牛学汉等人撑排的故事,揭示那个年代里的荒诞人生和真情,是作家在山区里伐木撑排经历的再现。莫言的《蛙》以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半个世纪的姑姑的人生经历,作家自认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其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文学理念的实践。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私人化叙事,已经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简单化地将作家自己的人生细节放进作品,也不再以自传体、半自传体予以标榜,而是以贴近自我、贴近生活的姿态,将人生的回忆、自我的情感融入作品。

小说总是讲述有意思的故事,小说的传奇性总是为作家们所热衷,关注人物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具有神奇意味的场景、具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使作品呈现出传奇色彩。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诸多作品关注传奇性叙事:竹林的《魂之歌》将小说的背景置于滇缅边界,描写主人公刘强、刘仁祥、艾蛟不同的人生追求与遭际,在寻找与争夺能开启地球轴心魔石的曲折情节中,神秘的山青族风习,恐怖的麻风村生活,离奇的芒果寨村落,惊险的玉石市场,呈现出小说迷离奇幻的传奇色彩。艾伟的《风和日丽》以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生父的情节,引出了一位神秘将军的风流韵事,同父异母的弟弟尹南方阴差阳错地爱上了杨小翼,杨小翼被父亲“驱赶”出北京,杨小翼解救出身陷囹圄的将军父亲,杨小翼用自己的身体与他人做交易,杨小翼经历了爱情夭折、婚姻失败、痛失爱子的多种

磨难,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严歌苓的《陆焉识》是一部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精神嬗变的磨难史,聪慧而倜傥的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在继母冯仪芳的操持下被迫娶了自己娘家侄女冯婉喻,陆焉识去美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大学教授,却在五十年代因过激言论成为“反革命”而获刑,在西北大荒漠上改造了二十年。“文革”结束后,获释回家的陆焉识却发现妻子冯婉喻已经失忆。人物的坎坷遭际不幸命运,使作品充满了传奇意味。叶兆言的《很久以来》讲述两个女子阴差阳错的人生故事:1941年南京沦陷时冷春兰和竺欣慰在学昆曲时相识,从此命运就牵连在一起,她们都喜欢风流倜傥的卞家六少明德,欣慰与明德结合,春兰变成老姑娘。明德后来死于劳改农场,欣慰嫁给肉联厂的闰逵,闰逵强奸了邻居春兰。“文革”时,欣慰因反革命罪被枪决,春兰嫁给了曾强奸自己的闰逵。两个女子的相识似乎就决定了她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使小说呈现出具有蹊跷意味的传奇色彩。叶弥的《风流图卷》讲述了祖孙三代的传奇故事:著名园林设计大师柳爷爷一直试图融入新时代新生活,在知识分子被改造的语境中饱受欺凌与侮辱,他抱着一盆盛开的昙花坐在一堆柴火上离开了人间。留美归来风流倜傥的父亲孔朝山是部队医院精神科医生,却一生都在抗拒改造,在妻子离开他、情人与他人结婚后,他变得衰老平庸了。孔燕妮的故事与她的成长缠绕在一起,她的成长是从身体觉醒开始的,她与军人杜克之间的爱情,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刘爷爷收养的佣人张风毅等,构成了孔燕妮人生的传奇故事。

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以寓言化叙事讲述故事成为一种现象,作家常常以带有某种寓意的构思,或假托一个故事说明道理,或寻找拟人化角度叙述历史,或借用比喻性手法寄托哲理,使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有意味的故事叙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叙写了中国乡村自土改到改革开放的历史,通过一个被冤杀的地主西门闹投胎为驴、牛、猪、狗展开叙述,演绎西门闹与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的悲欢故事,西门闹最终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小说在寓言化过程中构成了对历史的戏谑和颠覆。阎连科的《受活》以荒诞故事既反思了历史、又针砭了现实,具有深邃的意蕴。小说通过茅枝婆耿耿于怀的“退社”,反思了解放后在权力支配下诸多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通过柳县长购买列宁遗体荒诞计划的实施与努力,通过组织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的经过,既针砭了权力主宰下的无所不能劳民伤财,又

揭示出金钱至上道德沦落的社会现实。小说在寓言式的荒诞故事中,具有形而上的深刻意蕴,表达出作家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阎连科的《丁庄梦》以平实的笔触描写了中原地区农村艾滋病的发生与蔓延,展现出乡村社会中农民们为摆脱贫困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窘境,细致呈现出艾滋病村中的挣扎与埋怨、渴望与绝望、生存与死亡中的种种心态,生动展示了艾滋病人的生与死,在作家对于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焦虑中,表现出其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与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小说以一个血头丁辉的儿子、已死去的12岁孩子“我”的视角讲述故事,“我”是代父赎罪而被人毒死的,“我”就被埋在爷爷屋后墙下的角落里,奇特叙事视角的择取,使作品具有了寓言化叙事的意味。格非的《人面桃花》以主人公乡村女子秀米等人对于桃花源的追寻,对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描写中,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寓言化色彩。遭贬官回乡的陆侃要将陶渊明的桃源梦化为现实,他想在普济建立大同世界,却突然从普济消失不知所终。情窦初开的女儿陆秀米爱上了以养病为名来到普济的革命党人张季元,但他们的爱情却随着革命党的被剿灭、张季元猝死而告终。秀米遭遇土匪绑票被劫持到湖心小岛,革命党人六指木匠收编土匪攻打府州,起义失败后秀米被送往日本。几年后受革命党人的指派秀米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到普济,建立革命学堂进行革命准备,在清兵的一次围剿中秀米被捕孩子被杀,在秀米即将被处死前夕辛亥革命爆发,被释放的秀米回到普济在平淡的岁月中逝世。小说中的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构想,具有了寓言化叙事的特点,演绎了三代革命者的理想和追求。

新世纪长篇小说在叙事方面呈现出新的倾向、新的追求,无论是日常化叙事、私人化叙事,还是传奇化叙事、寓言化叙事,都可以见出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叙事方式上的探索与实验,呈现出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新变。

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也呈现出某些与长篇小说文体发展不利因素,在文学市场化消费化的语境中,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叙事的碎片化、叙事的影视化的缺憾,一些作家常常在对于日常化叙事的迷恋中,忽略小说讲述有意思故事的文体本性,而津津乐道于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甚至将小说叙事迷失于历史或现实琐碎细节平庸叙事的絮叨中,在缺乏情节张力的叙写中,使长篇小说在巨幅的篇章中,却缺乏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使小说成为平庸琐碎细节的堆砌。由于受到影视剧巨大市场和稿酬收益的影响,诸多小说家纷纷涉足影视剧编剧的行列,使一些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之初就考虑如何将小说搬上银幕,甚